

融合策略、歧视感知与农民工幸福感^{*}

——基于福建省 2393 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卢海阳 张 敏

提 要：基于 2018 年福建省 9 个地级市 2393 个农民工有效样本，本文系统考察了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可能存在交互效应和群体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采取同化和整合策略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幸福感，而歧视感知会显著降低农民工的幸福感；整合策略可以有效缓解歧视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分样本估计结果显示，同化策略能显著提高女性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的幸福感，但对男性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农民工 幸福感 融合策略 歧视感知

一、引言

幸福是人类终其一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如何追寻更加美好的生活是古今中外经久不衰的话题（Camfield & Esposito, 201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自改革开放以来，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贡献了重要的“人口红利”，成为联结城市与农村的重要纽带。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背景下，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不仅是政府服务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农民工健康及其促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603052；主持人：卢海阳）和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项目“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机理与对策研究”（主持人：卢海阳）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责编和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举措。

理论上来看，幸福感常被界定为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常被当作衡量个体和社会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评价指标（Cohen et al., 2003）。自威尔森（Wilson, 1967）撰写的《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一文发表以来，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Frey, 2010; Oishi et al., 2016）。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 1974）提出的关于国民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即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国民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不少学者将视线转移到有关中国居民的幸福感研究上。例如，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等多种来源的数据，李佳源（Li & Raine, 2014）研究发现，在1990—2010年，中国居民的年平均收入上涨了9倍，但国民幸福水平却并没有呈现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提高幅度，反而在总体上保持着下降的趋势。从历时效应来看，自1990年以来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持续下降，并在2000—2005年跌入了谷底，随后才开始缓慢回升（Easterlin et al., 2012）。对于这一“中国之谜”，有研究者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民众需求类型从物质型向享受型的升级可能是引起幸福感水平呈“U形”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李路路、石磊，2017）。

纵观已有文献，国内现有的幸福感研究大多从国家层面展开或聚焦于城市居民群体，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还较为匮乏。然而，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高达2.88亿人，他们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用辛勤的劳动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更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①。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的幸福状况不仅关系着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深入推进，对维持宏观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值得强调的是，目前还鲜有研究从社会融合的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幸福感。从理论上来看，社会融合意味着迁移人口在经济、心理、文化和身份等多方面向本地人趋同或转变的过程，而在过程中，融合程度较低的个体通常更容易感受到外界的歧视，进而导致幸福感的下降（Potochnick et al., 2012; Berry & Hou, 2017）。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18年福建省2393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探讨农民工的城市

^① 国家统计局，2019，《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特别关注不同的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交互效应和群体异质性。

二、文献述评

主观幸福感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感受，既生于内部主观心理机制，又发自于外部客观要素（Mathews, 2013）。从主观层面来看，融合策略是流动人口依据社会文化和心理状况变化而主动选择的一种社会适应态度，是体现个体城市融入的核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而从客观层面来看，歧视感知尤其是由户籍制度强加的政策歧视以及城市居民给予的舆论歧视可能会严重损害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其对自身幸福感的评估（郭进等，2018）。

（一）融合策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融合策略”（acculturation strategies）一词最早是由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家约翰、W. 贝瑞从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中延伸出来的。早期的文化适应理论认为，移民的文化适应是单维度、单方向的，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总是处于从完全的原有文化到完全的主流文化这一直线式的发展过程中。通过逐渐弱化原有的种族传统、重塑适应新定居地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这些个体最终将到达完全的主流文化这一自然终点，即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Gordon, 1971）。“文化同化模型”虽然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美国社会的“熔炉观”和“美国化”等期望，但是由于仅强调主流文化对文化适应者的单方面影响，而忽视了文化适应者和流入地社会的双向互动，因此受到了多数学者的质疑和抨击。以贝瑞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移民在客居国社会的文化适应过程应该是双维度的、适用于多元文化社会的（Berry, 1997）。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待自己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所处新群体的态度，移民在流入地的文化适应应包括四种策略：整合（移民既重视保持对原种族文化和身份的认同，同时也想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同化（移民不再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却偏好与流入地社会的互动）、隔离（移民只重视本民族文化，而拒绝参与到流入社会文化中）、边缘化（移民既不重视本民族文化，也拒绝融入流入地社会）（Berry, 1980）。通常而言，整合策略是最积极、最具适应性的城

市融入策略，同化策略和隔离策略居中，而边缘化策略则是最消极且适应性最差的一种融入策略（Berry，2005）。

贝瑞的双维度理论模型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并且在后续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将其拓展到与移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探讨上。不少研究发现，融合策略越积极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越强。例如，贝瑞等（2017）通过对加拿大移民的调查发现，整合策略对移民的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采取整合策略参与城市生活的移民比其他同龄人表现出更高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海纳尔（1997）认为，迁移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文化冲击、行为偏见和社会隔离等，但随着移民对流入地社会的逐渐适应，迁移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对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会被不断减弱。流动人口在行为方式、社会交往等方面越是向主流社会靠拢，得到的社会支持就会越多，感受到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则会越少，从而有助于对其生活状况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Fang et al. , 2017）。与之相反，隔离型尤其是边缘型策略则会显著降低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阿布·雷亚（2006）研究发现，以边缘化策略适应以色列社会生活的欧洲留学生呈现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孤独、失眠等）。边缘化意味着留学生们既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也丧失了原籍种族的支持；双重偏见、敌意和歧视的叠加加重了他们城市生活的心理负担，也直接冲击他们的幸福感受，降低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相比于国外文献，国内目前还鲜有学者关注到融合策略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仅有少部分相关研究探讨了社会融合的各个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例如，季永宝等（2017）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主要分为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五个层次，伴随融合层次由低向高的转变，农民工的幸福感也不断提高。就业和收入是农民工经济融入的首要问题，也是驱动农民工背井离乡的主要动力，经济地位的提高可以有效增强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王玉龙等，2014）。在社会适应方面，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吴奇峰等，2017）。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紧密度越高，农民工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其生活满意度也越高（崔岩，2012）。此外，有学者指出，清晰的身份认同能够激励个体的自我提升并减少不确定感，对人格和幸福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李春、宫秀丽，2006）。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多数农民工在对自己身份作总体性评价时，呈现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李荣彬、张丽艳，2012）。

(二) 歧视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歧视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不公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中。学术界将“歧视”定义为：不以能力、贡献、合作等为依据，而是以诸如身份、性别或资源为依据，对某一社会群体进行“有区别的对待”，其结果是某些社会群体或成员受到某种程度的剥夺，从而造成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黄家亮，2005）。“强势心理学”和“歧视知觉”是目前社会心理学界有关社会歧视研究的两大核心主题（Pascoe & Richman, 2009）。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歧视作为一种有失公允、偏颇性的安排，会对弱势群体的心理适应带来一系列的消极作用（如无助感、焦虑和抑郁等），影响个体的自我认知与评价，并进一步削弱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和主观幸福感（Schmitt et al. , 2014）。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现象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研究发现，48.3% 的农民工表示曾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感受到“被歧视”（李升、黄造玉，2017），其中，就业机会歧视、就业待遇歧视和就业保障歧视是农民工常面临到的三种社会歧视类型（曹信邦，2008）。显然，强烈的被歧视感知会对农民工的幸福感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高福海等（2012）研究表明，歧视感知越强，农民工越容易产生焦虑、抑郁和犯罪等倾向。胡伟等（2012）对北京和杭州两地农民工的研究发现，较高的歧视感知不仅会增加农民工抑郁、心理烦恼和孤独感等负面情绪，还会降低农民工的自我价值感，使其变得退缩、不自信，进而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较强的不利影响。李强（2004）采用“剥夺理论”对农民工歧视问题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等方面受到了绝对剥夺、相对剥夺和多阶剥夺。随着近年来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大幅度改善，相对剥夺感成为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城镇居民间差距的扩大增加了农民工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导致农民工幸福体验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研究发现，歧视感知并不必然导致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下降（Shek, 2005）。歧视与幸福感之间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中间变量（如社会支持、自尊和希望等），这些变量会对歧视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一定程度上可能降低歧视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刘杨等，2013）。

(三) 简要述评和研究设计

总的来看，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两点重要的不足之处：第一，国内目前多数研究

偏重于以农民工为客体的视角（如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测量和评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鲜有研究从农民工主体性视角切入，以农民工主动选择的融合策略来评价其城市融入程度，并进一步就融合策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进行讨论。仅有的一部分研究（Gui et al., 2012）虽然考虑到了融合策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但不足的是，这些文献在构建城市融合策略时大多选择直接套用西方移民研究中的理论框架。显然，由于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农民工的特殊性，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理论框架会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理论困境。一方面，与西方跨国移民研究不同，我国的城乡流动人口由于仅在国家内部迁移流动，所要跨越的文化距离相对较小，更不涉及跨种族认同问题，因此直接套用西方模型来划分农民工的融合策略过于牵强。另一方面，文化融合双向模型假定移民的原种族文化和迁入地文化间不存在主次之分，且移民有心同时维系两种文化。但就中国农民工来看，这并不符合实际。多年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工业文明优先于传统农村文化的思想已经在农民工心中根深蒂固。流入相对富裕的城市社会、实现身份转化并最终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分子是多数农民工流入城市的根本目的，坚持并传播自己的农村文化并不符合该群体流动的初衷，也不利于其加快城市融入步伐（杨菊华，2009）^①。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内近年来关于是“社会融入”还是“社会融合”的概念争论，恰恰是源于学者们对西方社会融合理论在中国适应性的不同理解。

第二，现有文献或单独关注融合策略对移民幸福感的作用，或单独考察歧视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缺少将融合策略、歧视感知和农民工幸福感置于同一框架下的研究，而综合考虑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两类因素对幸福感的交互效应的研究成果更是鲜见。根据西方国家对移民幸福感的研究，不同的融合策略可能使得歧视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Berry & Hou, 2017）。一般而言，融合策略越积极的移民常具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这些群体在心理和社会资源上更有能力应对歧视，从而有效减弱歧视感知对幸福感的抑制效用；相反，消极的社会融合策略则会进一步放大歧视对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如图）。因此，仅从主效应角度进

^① 西方的文化适应理论强调的是移民在文化交往和文化变迁过程中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平衡原有的种族文化和身份认同与流入地其他文化的融合。理论本身不涉及文化的优劣问题，也不存在放弃何种文化和选择何种文化之说。但是与之不同的是，我国乡—城移民的背后暗含着现代性的问题，城市文化可能存在对农村文化的替代。以农民工单方向融入城市优先，并不是代表作者认同城市文化优于农村文化，而仅仅是在中国国情下，鉴于中国流动人口的特点，融入比融合更契合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进程，更符合流动人口的单方向、功利性的流动初衷，也更加有利于提高其城市融入的速度和程度。

行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分情况讨论融合策略的调节作用。基于上述不足之处，本文拟作以下改进：第一，在变量操作化上，按照中国国情，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策略重新衡量、排列；第二，在分析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主效应的基础上，探讨融合策略对歧视感知影响幸福感的调节作用机制；第三，深度剖析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代际差异和户籍地差异。不同的性别、世代和户籍来源地的农民工在融合策略抉择以及应对歧视的处理方式上可能存在着较大差异，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分样本分析，将有助于提高相关结论和政策建议的针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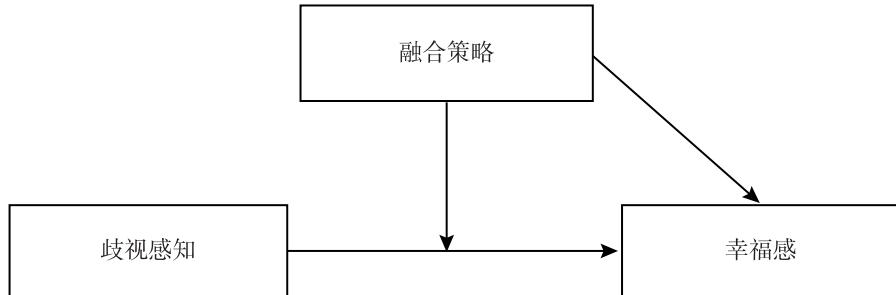


图 变量间逻辑关系图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福建全省 9 个地级市进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调查时间集中在 2018 年 1 月—2018 年 10 月，调查对象是年龄在 16—65 周岁，在城市地区从事非农就业且散居于城市社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受限于农民工群体较强的流动性和分散性，难以准确估计各地农民工的实际人口数量，进而无法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分配各地市的样本数量。因此，作为替代方案，本研究结合各城市的常住人口比例和计划收集的样本总量，按比例计算每个城市的调查样本数量。调查采取农民工口述、调查人员填写问卷的方式采集数据。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和前后回答明显矛盾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2393 个。

从样本分布情况来看，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 58.46% 和 41.54%。样本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37 岁，其中，1980 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 59.79%，1980 年以前出生的老一辈农民工占 40.21%。在教育分布上，样本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 9.50 年，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农民工占样本总量的 81.54%，其中，有 59.66% 的农民工仅有“初中及以下”学历。从户籍地来看，拥有务工所在地级市户口的本地农民工占样本总量的 40.46%，跨市或跨省务工的外来农民工占 59.54%。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 幸福感

幸福感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其测量方法是由受访农民工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做出总体性评价。具体而言，是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的：“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幸福吗？”变量赋值为 1—5 的整数，分别对应着选项“非常不幸福”“不太幸福”“一般”“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从样本分布结果来看，受访农民工的幸福感平均值为 3.65 分，说明农民工的幸福感水平总体上处于“一般”和“比较幸福”之间。

2. 融合策略

融合策略是表征移民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社会文化归属的重要指标。与西方的双维度理论模型不同，本文对融合策略的衡量，更偏重于从“城乡身份认同”视角出发，而非“种族认同”。究其原因，贝瑞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际移民，存在不同国家文化间碰撞而出现的种族认同问题，因此在对融合策略的衡量上采用“种族认同”更契合其迁移情境。然而，就中国农民工而言，由于仅是乡—城间的内部迁移，因此迁移带来的挑战更多地体现在城乡身份认同问题上。鉴于此，本文在参考贝瑞等（2017）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即农民工单方向融入城市优先），利用“您认为自己属于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和“您对城市是否有归属感？”两个问题，将农民工的融合策略重新划分排列为四种类型：同化（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且对城市有归属感）、整合（认为自己是农村人但对城市有归属感）、边缘化（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但对城市无归属感）和隔离（认为自己是农村人且对城市无归属感）。从样本分布情况来看，采取隔离策略的农民工数量最多，占总样本数的 67.68%。不同融合策略的幸福感分布中，以“同化”策略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幸福

感最强，均值达到 3.89 分；而以“隔离”态度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则幸福体验最差，仅有 3.57 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本文对融合策略重新排列的合理性（见表 1）。

表 1

农民工幸福感与融合策略分布（%）

幸福感类型	占比	融合策略			
		同化	整合	边缘化	隔离
非常不幸福	.919	1.60	.721	1.064	.926
不太幸福	5.597	3.20	2.342	4.255	6.975
一般	32.832	13.60	27.568	27.660	36.420
比较幸福	48.956	68.00	54.595	55.319	45.185
非常幸福	11.696	13.60	14.775	11.702	10.494
观测值	2393	125	555	94	1620
均值	3.649	3.888	3.804	3.723	3.573

3. 歧视感知

社会歧视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由于歧视行为大多以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很难从第三者的角度进行客观测量，因此，学界大多通过被歧视者的自我报告来反应其是否受到过有区别或不公平的对待，即歧视感知。参照李树苗等（2008）的研究，本文通过询问“您是否在城市中受到过歧视或不公平对待？”来测量农民工的歧视感知，将回答“是”的农民工赋值为 1，其他赋值为 0。统计结果显示，约有 15% 的农民工表示自己在城市务工和生活期间遭受到歧视或不公平对待。

4. 控制变量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幸福感还受性别、年龄、婚姻等人口学特征（Fuller-Laglesias et al., 2015）和城市规模（Okuicz-Kozaryn & Adam, 2013）等因素影响。因此为尽量消除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模型估计偏误，本文参考已有研究（例如，刘靖等，2013；Graham et al., 2017），引入以下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劳动报酬、工作时长、工资拖欠、朋友数量、压力感知、社会信任、户籍和务工所在地。

上述 4 类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含义或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 = 1；不太幸福 = 2；一般 = 3；比较幸福 = 4；非常幸福 = 5	3. 649	0. 793
同化	“您认为自己属于城里人且对城市有归属感？”否 = 0；是 = 1	. 052	. 222
整合	“您认为自己不属于城里人但对城市有归属感？”否 = 0；是 = 1	. 232	. 422
边缘化	“您认为自己属于城里人但对城市没有归属感？”否 = 0；是 = 1	. 039	. 194
隔离	“您认为自己不属于城里人且对城市没有归属感？”否 = 0；是 = 1	. 677	. 468
歧视	“您是否在城市中受到过歧视或不公平对待”否 = 0；是 = 1	. 149	. 356
年龄	您当前的年龄（岁）	37. 006	12. 600
年龄平方	当前年龄的平方值	1528. 128	1013. 298
性别	女 = 0；男 = 1	. 585	. 493
受教育程度	“您的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 = 3；大专 = 4	2. 344	1. 040
婚姻状况	“您是否已婚？”未婚或其他 = 0；已婚 = 1	. 691	. 462
健康状况	“您目前身体是否健康？”否 = 0；是 = 1	. 733	. 443
劳动报酬	您去年的月平均工资（元）	3833. 675	1547. 681
工作时长	“您每天工作的时间？”（时）	9. 379	2. 420
工资拖欠	“您现在的工作是否有工资拖欠问题？”否 = 0；是 = 1	. 089	. 284
朋友数量	“您在本地的真心朋友？”（个）	2. 816	2. 292
压力感知	“您在城市生活是否感觉有较大压力？”否 = 0；是 = 1	. 227	. 419
社会信任	完全不信任 = 1；比较不信任 = 2；一般 = 3；比较信任 = 4；完全信任 = 5	3. 449	. 850
户籍地	“您是否是本市/县人？”否 = 0；是 = 1	. 406	. 491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计量模型选择

按照研究惯例，因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时，需使用有序概率模型（包括有序 Probit 模型和有序 Logit 模型）。由于本文对因变量幸福感的度量采取离散的排序形式，因此本研究采取有序 Logit 模型（在下面各表中简称为“O-Logit”）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Happiness_i = \alpha + \beta X_i + \lambda Discrimination_i + \theta Controls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1）中， $Happiness_i$ 为农民工 i 的主观幸福感； X_i 是四类融合策略变量的矩

阵，即同化、整合、边缘化、隔离； Discrimination_i 为农民工 i 受到的歧视感知； Controls_i 为本文控制的其他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 α 为常数项， β 、 λ 、 θ 为各变量系数， ε_i 为随机干扰项。

（二）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的主效应分析

表 3 报告了使用有序 Logit 模型对全部有效样本进行拟合估计的结果。其中，第 2 列、第 3 列分别考察了核心自变量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第 4 列则同时考虑了这两类变量的影响。

1. 融合策略的影响

从融合策略有关变量的影响来看，同化策略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与现实社会情况相符。一方面，对城市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保持积极态度的同化个体可能会受益于城市社区更多的接受和社会支持，而高质量的社区支持则可以有效降低农民工在乡城迁移过程中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各种风险，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在迁入地的就业和社会融入，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水平（季永宝等，2016）。另一方面，这些从内心就认同自己属于“城里人”的农民工大多在城生活和工作多年，经济条件也明显优于原来的农村朋友，经济地位和身份的转变会使他们产生一定的优越感，对未来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这些都将有助于其幸福感的提升。

此外，整合策略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可以同时适应两种社会文化的个体大多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和亲社会能力（Nguyen & Benet-Martinez, 2013）。在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就业的过程中，采取整合策略融入城市社会中的农民工更善于利用这些能力来帮助自己获得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不仅如此，基于这种应变能力和亲社会能力，农民工还可以通过两种文化获得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自己及时排解生活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孤单感和焦虑感等消极情绪，避免出现因文化跨越而导致的文化失调问题，有效降低心理健康问题出现的风险。

2. 歧视感知的影响

从拟合结果来看，歧视感知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符号互动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个体需要借助于他人的反馈性评价来建立自我概念，歧视经历可能会降低个体对自我的评价，长期受到歧视的个体容易将他人的偏见态度内

化为自己的观点，从而损害个体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并进一步威胁个体的情绪适应和生活满意程度（David & Thompson, 2005）。在城市务工期间，受户籍制度、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重因素限制，农民工在社会交往、工作待遇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受到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的诸多不公平对待。强烈的歧视感知容易促使农民工产生巨大的无助感、挫败感和疏离倾向，从而失去构建城市社会支持系统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工的自尊，并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

3. 控制变量的影响

从表3的回归结果，我们还能得到以下结论。年龄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U形影响。性别对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男性农民工在生活中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和工作压力。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似乎有悖于前人的研究。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更高的教育程度意味着可能拥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但与此同时，农民工也将有着更高的期望。当教育收入提高带来的效益无法满足增加的期望时，农民工的幸福感则受到抑制。此外，婚姻、健康状况、本地朋友数量、社会信任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报酬的增加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但工作时间延长、工资拖欠和则会降低农民工的幸福体验。

表3 融合策略和歧视对农民工幸福感的主效应分析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年龄	-.100 *** (-.027)	-.094 *** (-.027)	-.096 *** (-.027)
年龄平方	.001 *** (.000)	.001 *** (.000)	.001 *** (.000)
性别	-.344 *** (-.086)	-.355 *** (-.085)	-.334 *** (-.086)
受教育程度	.029 (-.047)	.051 (-.046)	.027 (-.047)
婚姻状况	.739 *** (-.122)	.741 *** (-.121)	.742 *** (-.122)
健康状况	.426 *** (-.093)	.449 *** (-.092)	.414 *** (-.093)
劳动报酬	.000 *** (.000)	.000 *** (.000)	.000 *** (.000)
工作时间	-.046 ** (-.019)	-.040 ** (-.019)	-.040 ** (-.019)
工资拖欠	-.650 *** (-.137)	-.592 *** (-.136)	-.588 *** (-.136)

续表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朋友数量	.061 *** (-.019)	.072 *** (-.019)	.061 *** (-.019)
社会压力	-.518 *** (-.110)	-.488 *** (-.110)	-.465 *** (-.111)
社会信任	.456 *** (-.055)	.446 *** (-.056)	.441 *** (-.056)
户籍地	-.142 (-.095)	-.039 (-.093)	-.148 (-.095)
同化	.520 *** (-.172)	—	.511 *** (-.171)
整合	.414 *** (-.099)	—	.405 *** (-.100)
边缘化	.174 (-.198)	—	.187 (-.200)
歧视	—	-.509 *** (-.124)	-.496 *** (-.123)
务工所在地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	—
Wald 检验	Wald chi2 (24) = 373.21 ***	Wald chi2 (22) = 362.99 ***	Wald chi2 (25) = 397.62 ***
观测值	2393	2393	2393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三) 融合策略与歧视感知的交互效应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较高的歧视感知而言,其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的大小甚至方向并非是固定的,可能会因为融合策略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即融合策略在进城农民工的歧视感知和幸福感的负向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为此,本文将测量融合策略与歧视感知的变量分别构建交互项,并将交互项加入模型中进行拟合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begin{aligned} Happiness_i = \alpha + \beta X_i + \lambda Discrimination_i + \gamma X_i * Discrimination_i \\ + \theta Controls_i + \varepsilon_i \end{aligned} \quad (2)$$

式(2)中,假设农民工幸福感是关于融合策略、歧视感知和控制变量的函数,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 γ ,其他设定与式(1)相同。值得说明的是,由于非线性模型对应的概率密度函数为非线性的,因此,本文无法直接利用O-Logit模型以检验交互项的统计结果显著性。作为替代方案,本文将因变量幸福感视为连续变量处

理，采用 OLS 模型在控制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对自变量和交互项进行重新估计，具体拟合结果见表 4。

从表 4 来看，同化、边缘化与歧视所构建的交互项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整合与歧视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即整合策略在农民工的歧视感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对于采取整合策略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歧视感知对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露娜等（2008）认为，双文化个体可以依据社会学习的经验和对当前情境的认知做出一定的行动反应，个体的文化经验越丰富，越可以依据情境线索从文化框架中找到相匹配的行为。在遭遇不平等待遇后，以整合策略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可以通过整合各种资源，尝试多种途径来帮助自己及时摆脱和排解困境，从而避免出现心理或行为失常。这也意味着，与其他相比，整合类型的农民工对歧视的耐受力更强，他们更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歧视的负面冲击。

表 4 融合策略和歧视相关变量交互项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变量	自变量		因变量	
同化	.185 ** (.073)	.169 ** (.071)	.173 ** (.071)	.184 ** (.073)
整合	.150 *** (.038)	.159 *** (.039)	.150 *** (.038)	.159 *** (.039)
边缘化	.071 (.079)	.070 (.079)	.071 (.079)	.070 (.079)
歧视	-.192 *** (.045)	-.182 *** (.045)	-.196 *** (.044)	-.176 *** (.045)
同化 × 歧视	.174 (.247)	—	—	.236 (.248)
整合 × 歧视	—	.301 *** (.111)	—	.312 *** (.112)
边缘化 × 歧视	—	—	-.031 (.225)	.036 (.226)
常数项	3.380 *** (.213)	3.373 *** (.213)	3.376 *** (.213)	3.375 *** (.2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R ²	.140	.143	.140	.142
观测值	2393	2393	2393	2393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四）融合策略、歧视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融合策略、歧视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农

民工群体按照性别、代际、户籍所在地加以划分，分样本回归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同化策略对农民工幸福感有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中，同化对男性农民工的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但对女性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回归结果显示整合策略与歧视感知的交互项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影响男性农民工幸福感，且系数为正。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社会融合程度的加深，男性农民工更擅长利用新获得的市民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来减少遭受歧视的概率和减弱歧视的负向影响。

表5 融合策略、歧视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

解释变量	男性	女性	新生代	老一代	本地	外来
同化	.376 (-.258)	.715 ** (-.282)	.519 ** (.244)	.656 ** (.304)	.130 (.096)	.240 ** (.118)
整合	.400 *** (-.133)	.459 *** (-.159)	.404 *** (.131)	.468 *** (.167)	.196 *** (.051)	.130 ** (.059)
边缘化	-.010 (-.290)	.418 (-.306)	.153 (.258)	.142 (.415)	.101 (.128)	.069 (.102)
歧视	-.483 *** (-.149)	-.477 ** (-.201)	-.294 * (.170)	-.643 *** (.171)	-.203 ** (.079)	-.154 *** (.059)
同化×歧视	-.349 (-.851)	1.431 (-.919)	.985 (.819)	-.306 (.938)	.118 (.379)	.334 (.338)
整合×歧视	.918 ** (.370)	.558 (-.498)	.774 * (.428)	.651 (.423)	.450 *** (.161)	.232 (.168)
边缘化×歧视	.601 (-.730)	-.638 (-.979)	-.437 (.959)	.390 (.817)	-.021 (.332)	.084 (.310)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98	995	1431	962	969	1424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从代际差异来看，融合策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没有显著的代际差异，但歧视感知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加强烈的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在遭遇社会不公情境时他们会采取“以理抗争”或“以法抗争”等行为来反抗歧视，争取权益（杨富平、刘美华，2015）。从交互项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来看，整合策略和歧视感知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却不显著。黄嘉文（2015）认为，随着代际的转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诉求从单纯的“生存—经济”

转变为“身份—政治”，他们对自我发展和城市融入的需求日益高涨，致力于追求一种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身份”。高程度融入城市社会中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可能抵消了歧视感知产生的负向作用，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幸福感的提升。

就户籍差异而言，同化策略对本地农民工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但对外来农民工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外来农民工有着更高的城市融入意愿，更倾向于受城市同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整合和歧视的交互项对本地农民工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对外来农民工却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空间相邻和文化相似，本地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遭受结构性歧视和舆论歧视的概率远低于外来农民工；另一方面，由于本地农民工仍然留在当地工作，因此当其以整合策略融入城市时，他们不仅可以同外来农民工一样发展新建立的市民网络，还可以继续利用原生的亲缘、地缘和血缘关系网络帮助自己更快地适应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找到一份更理想的工作，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强幸福体验。

（五）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文章估计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文采取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调整幸福感赋值。前文对幸福感的衡量采取五分类量表，并利用有序 Logit 模型进行拟合分析。下文将幸福感转换为二值变量，并使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对于幸福感得分大于 3 的农民工赋值为 1，其他为 0（即稳健性检验一）。第二，改变融合策略操作化方式。前文利用“您认为自己属于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和“您对城市是否有归属感？”两个问题结合生成四种融合策略，但这只是一种假设。为了验证融合策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下文用“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城市”和“您是否愿意在本地定居”两个问题代替上文，并重新组合四种融合策略（即稳健性检验二）。第三，加入更多控制变量。考虑到社会保险和职业类型同样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体验的重要变量，而上文未将两类变量纳入控制范围内，这可能会高估核心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因此下文将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和职业类型纳入控制变量范畴，重新拟合分析（稳健性检验三）。

表 6 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仅将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6。从三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情况与前面的标准估计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无较大变化。进而验证了本文标准估计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研究结论较为可靠。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标准估计模型	稳健性检验一	稳健性检验二	稳健性检验三
同化	.511 *** (-.171)	1.060 *** (.259)	.441 ** (.176)	.467 ** (.186)
整合	.405 *** (-.100)	.486 *** (.118)	.330 ** (.142)	.387 *** (.101)
边缘化	.187 (-.200)	.354 (.238)	-.314 (.264)	.170 (.208)
歧视	-.496 *** (-.123)	-.516 *** (.135)	-.514 *** (.123)	-.481 *** (.1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393	2392	2392	2392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福建省 2393 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 通过 O-Logit 模型分析了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其中, 同化策略和整合策略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以同化策略和整合策略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采取边缘化和隔离策略的农民工群体; 歧视感知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 整合策略不仅可以提高农民工幸福感, 还能有效缓解歧视感知对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 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存在明显的群体异质性。同化策略能显著提高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的幸福感, 但对男性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本文结论的政策启示是: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建设的进程中, 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公共政策时应关注融合策略和歧视感知等因素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首先, 政府在引导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 不能一味强迫农民工立即适应并融入城市生活中, 要考虑到不同农民工在对先赋性农民身份认同的处理策略上有所差异, 避免给农民工造成太大压力。当然, 鉴于同化策略和整合策略有利于农民工幸福感的提升, 政府部门应该循序渐进地做好社会融合引导工作, 鼓励农民工多多参与社会组织的文化或公共事务, 保证流动人口享受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 增加对

城市生活的适应力，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程度，促进其幸福水平的提升。其次，政府要营造公平公正的人际环境，着力化解以二元户籍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导致城乡劳动力区别对待的社会歧视问题，积极倡导客观、和谐、包容的社会舆论导向，降低农民工城市生活的隔离感、失落感与孤独感，保障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最后，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要注意适当向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倾斜。这三类农民工有着更强的留城意愿和市民化潜力，政府和企业单位可通过增强职业技能培训、鼓励社会交往来提升这类群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他们的城市融入能力，使他们有更多追求幸福的选择。

参考文献：

- 曹信邦，2008，《就业歧视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消极影响》，《人口与经济》第1期。
- 崔岩，2012，《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高福海、李平、江雯，2012，《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状况的调查分析——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企业为例》，《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
- 郭进、徐盈之、顾紫荆，2018，《户籍歧视与城市移民的幸福感缺失——包含非收入因素的扩展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4期。
- 胡伟、王芳、马丽霞、林丹华，2012，《歧视知觉、逆境评价和流动人口心理适应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5期。
- 黄家亮，2005，《论社会歧视的社会心理根源及其消除方式——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社会歧视》，《思想战线》第5期。
- 黄嘉文，2015，《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及其代际差异》，《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季永宝、高敬云、杨俊，2016，《流动人口的社会整合程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城市问题》第7期。
- 李春、宫秀丽，2006，《自我分类理论概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李路路、石磊，2017，《经济增长与幸福感——解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李强，2004，《社会学的“剥夺”理论与我国农民工问题》，《学术界》第4期。
- 李荣彬、张丽艳，2012，《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人口与经济》第4期。
- 李升、黄造玉，2017，《流动人口的“被歧视”问题研究——基于一项对北京城中村的调查》，《北京社会科学》第3期。
- 李树苗、任义科、靳小怡、费尔德曼，2008，《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整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2期。
- 刘靖、毛学峰、熊艳艳，2013，《农民工的权益与幸福感——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

8期。

- 刘杨、李泽、林丹华, 2013,《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与自尊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6期。
- 卢海阳、杨龙、李宝值, 2017,《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 王玉龙、彭运石、姚文佳, 2014,《农民工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社会支持和人格的作用》,《心理科学》第5期。
- 吴奇峰、苏群、赵霞, 2017,《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杨富平、刘美华, 2015,《进城农民工的反歧视意识与反歧视行为——基于浙江省L区的调查与分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第2期。
- 杨菊华, 2009,《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第1期。
- 张岩、杜岸政、谭顶良、雷婷婷、周炎根, 2017,《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社会疏离感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第6期。
- Abu-Rayya, H. M. 2006, “Acculturation and Well-being Among Arab-european Mixed-ethnic Adolescents in Israel.” *Adolesc Health* 39 (5).
- Berry, J. W. 1997, “Lead Article-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46 (1).
- Berry, J. M. 1980,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In A. Padilla (ed.). *Acculturation: Theory Model and Some New Finding* 9 (25).
- 2005, “Acculturation: Living Successfully in Two Cul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9 (6).
- Berry, J. W. & F. Hou 2016, “Immigrant Acculturation and Well-being in Canada.” *Canadian Psychology* 57 (4).
- 2017, “Accultur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Well-being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of Immigrants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61 (29 – 39).
- Camfield, L. & L. Esposito 2014,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Perceived Economic Statu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High-and Low-income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59 (3).
- Cohen, S., W. J. Doyle, R. B. Turner, C. M. Apler, & D. P. Skoner 2003, “Emotional Style and Susceptibility to the Common Cold.”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5 (4).
- David, B. D. & K. Thompson 2005, “Self-Concept and Delinquency: The Effects of Reflected Appraisals by Parent and Peers.” *Western Criminology Review* 6 (1).
- Easterlin, R.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Nations &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 Easterlin, R. A., R. Morgan, M. Switek, & F. Wang 2012,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 – 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 (25).
- Fang, L., R. C. F. Sun, & M. Yuen 2017,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An Acculturation Scale for China’s Rural to Urban Migrant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58 (1 – 11).

- Frey, B. S. 2010, "Happines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Economic Journal* 110 (466).
- Fuller-Iglesias, R. Heather, N. J. Webster, & T. C. Antonucci 2015, "The Complex Nature of Family Support across the Life Span: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1 (3).
- Gordon, M. M. 1971, "The Nature of Assimilation and the Theory of the Melting Pot."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Psychology* 3.
- Graham, C. , S. Zhou, & J. Zhang 2017, "Happiness and Health in China: The Paradox of Progress." *World Development* 96 (231 – 244).
- Gui, Y. , J. W. Berry, & Y. Zheng 2012, "Migrant Worker Accultur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6 (4).
- Hener, T. , A. Weller, & R. Shor 1997, "Stages of Acculturation as Reflected by Depression Reduction in Immigrant Nursing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43 (4).
- Li, J. & J. W. Raine 2014, "The Time Trend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6 (2).
- Luna, D. , T. Ringberg, & L. Peracchio 2008, "One Individual, Two Identities: Frame Switching among Bicultural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5 (2).
- Mathews, J. 2013, "The Nature and Dynamics of Happiness: A Psychological 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3 (1).
- Nguyen, A. M. D. , & V. Benet-Martinez 2013, "Biculturalism and Adjustment: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 (1).
- Oishi, S. , S. Kesebir, & E. Diener 2016, "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 (9).
- Okulicz-Kozaryn, A. 2013, "City Life: Ranking (Livability) Versus Perceptions (Satisfac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0 (2).
- Pascoe, E. A. , & L. S. Richman 2009,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Health: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 (4).
- Potochnick, S. , K. M. Perreira, & A. Fuligni 2012, "Fitting In: The Roles of Social Acceptance and Discrimination in Shaping the Daily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Latino Youth."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3 (1).
- Schmitt, M. T. , N. R. Branscombe, T. Postmes, & A. Garcia 2014, "The Consequence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 (4).
- Shek, D. T. L. A. 2005,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nese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elinquency and Substance Abuse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Economic Disadvantag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 (1/3).
- Wilson, W. 1967,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7 (4).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刘学